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晚清小說的女學論述

doi:10.7013/CCTHCWHSNK.200312.0061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5), 2003

作者/Author：黃錦珠

頁數/Page：61-7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200312.006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晚清小說的女學論述

黃 錦 珠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晚清時期，小說曾被賦以強大的社會教育及傳播責任，諸多政治、社會方面的新觀念、新議題，都被「置放」在小說裡面，並希冀藉此達成教育國民、改良社會、振興國族的重責大任。倡議女權，啓蒙女界也是其中一個重要課題。現存可見的晚清小說文本中，所述及追求女權的具體作法，幾乎不出廢纏足與興女學兩項。興女學的呼籲、女學堂的創辦，使得傳統女子開始擁有接受體制化教育的機會，並且因為上學的實際需求，名正言順的走出深閨內室，生活空間及活動場域也隨之突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範。種種變動，不但對女人本身產生各種正負面的衝擊，也使男人形成焦慮。這種焦慮反映在小說文本中，於是出現不少「女界怪現象」的描述。本文擬根據晚清小說中有關女學的描繪與論述，討論女學倡興對當時女人的各種身心、正負衝擊，以及對男人的影響，由此觀看晚清時期婦女教育與性別議題在小說中的顯現情形，並從中抽繹當時對婦女教育的思考與疑慮。

關鍵詞：晚清小說 女學 女權 性別研究 婦女教育

一、前言

中國的女子教育絕非始於晚清，但女子教育正式納入學制卻是在晚清時期。於家庭的空間之外開闢獨立的地點，作為女子接受教育的正式場所，也是從晚清時期開始。不過在清廷正式下詔改書院、興學堂之後，女子學堂還是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才得以納入正式學制，而即使納入學制，在教育年限、教育層級與學堂種類各方面，仍與男子教育完全區隔，且遠遠落於其後。清廷正式下詔改書院、興學堂，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事。奏定女學堂章程，正式將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則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事，時間上晚了六年，且與男子比較起來，女子所受的教育仍十分有限。當時女子所能得到的最高教育是初級師範教育，女子小學堂與女子師範學堂，較之男子小學堂與男子師範學堂均各少一年，且無中學堂、實業、專門及大學學堂之設置。從初等小學堂算起，女子所能受到最高教育的年限，總共是十二年，而男子則長達二十六年。^{註一}造成男女教育完全分辦且不均等的原因，是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性別分野，唯性別分野所形成的差別待遇，原也不止於教育方面。不過，婦女之能逐漸突破傳統性別範限，知識能力的提升是一個重要契機，因此晚清女學堂的成立及其正式納入學制系統，實為婦女突破傳統，邁向現代的重要里程之一。當然，突破往往不是順遂輕便的，晚清女學除了在政治、制度面的承認上有過一番波折外，在社會習俗的評價上也歷經不少坎坷才得以被逐漸接受，而種種接受、期許乃至排斥，由當時的小說裡面都不難看到各種角度的反映、折射或再現。

晚清時期，小說曾被賦以強大的社會教育及傳播責任，諸多政治、社會方面的新觀念、新議題，都被置放在小說裡面，並希冀藉此達成教育國民、改良社會、振興國族的重責大任。女學議題及其相關現象之所以出現在小說文本中，乃至成為其中主要題材，實與此息息相關。現存可見的晚清小說文本，涉及女學論述者，多數與女權之提倡同時並存，因為晚清維新議題所述及倡導女權的具體作法，幾乎不出廢纏足與興女學兩要項。興女學的呼籲、女學堂的創辦，使得傳統女子開始擁有接受體制化教育的機會，並且因為上學的實際需求，名正言順的走出深閨內室，生活空間及活動場域也隨之突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範。種種變動，不但對女人本身產生各種正負面的衝擊，也使男人形

註 一：參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收錄於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203-213。

成焦慮。這種焦慮反映在小說文本中，於是出現不少「女界怪現象」的描述。本文擬根據晚清小說中有關女學的描繪與論述，討論女學倡興對當時女人各種身心、正負衝擊，以及對男人的影響，由此觀看晚清時期婦女教育與性別議題在小說中的顯現情形，並從中抽繹當時對婦女教育的思考與疑慮。

其實小說中可以觀察到的面向，有時候會比婦女問題的其他文本要多得多。小說雖未必條理化的表達意見或思維，但當小說書寫者在文字構築的世界中討論婦女議題，描述婦女的生活、行動時，除了書寫者有意表述的看法與感受外，字裡言外流露的許多訊息，其實是比書寫者所能想到、感到的要來得多，此中所呈展的婦女問題面貌也可能比較立體，因此本文除了勾勒文本表層可見的看法與現象之外，也嘗試探析文字裡層所流露的思緒及訊息。

本文選擇以供討論的小說文本，乃以興辦女學或提倡女權為主要敘述內容者，在這些小說中可以觀察到當時對於女子教育的種種提倡或疑慮，至於其他小說零星提及或反映的女學意見或現象，與上述小說所述者往往大同小異，為免討論材料過於零散瑣碎，暫且摒除不論。另有部分描述教育現象的小說可以提供一參照系，雖未必予以精細討論，仍會在論述中適時援用。茲依刊行年代將擬進行討論的主要小說表列如下：

刊行年代	書名	回數	作者署名	刊行者
1904	女獄花	12回	王妙如 ^{註二}	(未署明)
1907	黃繡球	30回	頤瑣 ^{註三}	新小說社
1907(7月)	女子權	12回	思綺齋 ^{註四}	作新社
1907(7月)	女媧石	8回，未完	海天獨嘯子 ^{註五}	東亞編輯局
1909	最新女界鬼域記	10回	蹉跎子 ^{註六}	小說進步社
1909-1911	俠義佳人	40回，未完	績溪問漁女史 ^{註七}	商務印書館
1911(5月)	六月霜	12回	靜觀子 ^{註八}	改良小說社
1911	娘子軍	12回	佚名	改良小說社

註二：《女獄花》末附羅景仁〈跋〉云：「王妙如，名保福，泉唐人士。幼時性質聰慧，且嗜書史，年二十三，匹予為偶。予每自負得閨房益友，乃結褵未足四年，而竟溘然長逝矣。其生平所著之書，有《小桃源》傳奇、《女獄花》小說、唱和集詩詞。而《女獄花》一部尤為妙如得意之作，〔……〕光緒甲辰仲春，泉唐羅景仁志于雙人軒」。參《女獄花》（《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64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頁760。

上述八部小說^{註九}為現存且筆者所能得見者，根據阿英《晚清小說史》的敘述，當時出現的同類小說其實要比這些多得多，只可惜現在大半已不得見。^{註十}由上表所列，可以發現多數作品乃出現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及其以後。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學部奏定女學堂章程，女學正式納入學制系統，這項朝廷學制上的新事件，或許是激促相關小說發表的因素。晚清小說與當時政治社會之密切互動，於此亦可見一斑。

二、受教權與知識權

晚清的知識分子相信，教育的轉化力量是創建嶄新國民與理想公民的重要法門，透過教育，青年學子將會了解現代國族主義的迫切性，並學著承擔起國民的權利與義務，^{註十一}老大中國則可以透過青年學子的認知提升與成熟，脫離飽

註 三：頤頊之真實姓名有異說，本文暫採信原名湯寶榮之說。湯寶榮（約1860前後—約1932前），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字伯遲，號頤頊，室名頤頊室、小吳船。商務印書館舊宿，任為總記室。涵芬樓叢刊，什九經其校刊。參郭長海〈《黃繡球》的作者頤頊考〉，《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4期，頁241-242。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頁222。

註 四：「思綺齋」真實姓名不詳，但另有署名相同之小說《碧海珠》一部。參《碧海珠》（《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38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頁265-310。

註 五：海天獨嘯子，真實姓名不詳。

註 六：蹉跎子，真實姓名不詳。

註 七：續溪問漁女史，真實姓名不詳。

註 八：靜觀子，真實姓名不詳。

註 九：本文所採用這八部小說的版本，分述如下：《女獄花》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64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黃繡球》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40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女子權》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64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女媧石》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25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最新女界鬼域記》收錄於《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品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俠義佳人》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64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六月霜》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55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1。《娘子軍》收錄於《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品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以下凡引用小說原文，均不再贅述其版本資料，僅註明回數、頁數。

註 十：參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頁105-115。阿英所提及晚清有關婦女問題的小說至少有十八種，但其中筆者曾見者僅四種。現今未見的小說中，至少還有三種，其內容應該與女學有關，即南武靜觀自得齋主人著《中國之女銅像》、紅葉《十年遊學記》、如如生《女學人傳》等。

註十一：參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

受歐風西潮侵襲而動盪的惡劣處境。新式教育於是成為許多在朝與在野之士努力提倡的一項維新事業。對於教育的提倡與冀望再現於小說之中，出現了一批以描述學堂與學生為內容的作品，除了欲藉小說表述倡導教育的理念外，小說本身也被視為教育事業的一個環節——小說是一種普及下民、啓迪智識的「教科書」。然而以教育或學生為題材的各種「教育小說」^{註十二}裡面，幾乎沒有女學的位置。現存可見的《未來教育史》、《學究新談》、《苦學生》等書，所表述的絕大多數是男學堂、男學生。例如《未來教育史》，現有內容共四回，以描述新舊學制及學校教法（均為男子教育）的相關現象為主，僅在第三回出現一句與女學有關的話，即主人公黃率夫勸阿辛出面「提倡女學」。《學究新談》共三十六回，全書計二六六頁（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本為據），亦以描述男子學堂新舊雜陳的現象為主，僅在第二十三回以約二頁的篇幅，簡略描述由妓女出資興辦的「移風學堂」表演歌舞的概況（有趣的是，其他男學堂的表演，就不是「歌舞」）。《苦學生》則描述男學生黃孫刻苦向學的故事，全書未見任何女學生出場。^{註十三}其他同類小說亦多大同小異。如果不是提倡女權的小說出現，真教人懷疑女學話語是不是也會消失於小說版圖。由女學被納入學制的遲緩及女學堂年限、種類的不足，以及號稱描寫教育現象、提倡教育的小說中對女子教育的忽略、淡漠，可以見到無論在現實面或小說文本面，女學都被置放於邊緣性地帶，婦女教育在晚清時期的卑微處境，對應著婦女地位的低落與婦女人格的被漠視，而這種低落與漠視，其實是一道古老的歷史眼光，在女學初興的晚清時期，時時閃動在小說文本之左右，影響女學話語的表述形式與內容。

與「教育小說」著重於表述男學堂、男學生的現象相依存的是，文本凡述及男子要進學堂，必得到無條件的肯定與支持，即便家境艱難，障礙重重，文

卷2期，2001年6月，頁1-40。

註十二：晚清時人頗喜分類小說，大致是以內容題材作為分類依據，如歷史小說、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偵探小說、寫情小說等等均是。所謂「教育小說」乃指描述教育界或提倡教育之小說，主要以學生求學故事或學堂事件為題材。署名「棟」所作的〈小說種類之區別實足移易社會之靈魂〉一文，以及「小說林社」發佈的〈募集小說〉廣告（以上二文均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219、237），都曾提到「教育小說」一詞，並鼓勵大眾創作及閱讀。

註十三：《未來教育史》、《學究新談》、《苦學生》等三部小說，均收錄於《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1993）第53、54卷內。《未來教育史》全書未完，「提倡女學」一語見第3回，頁26。《學究新談》「移風學堂」表演歌舞概況見第23回，頁215-217。

本也以凸顯男子克服困難，家人在艱苦中勉力支持為積極正面之表現。這可以舉《苦學生》一書為例。《苦學生》中的主人公黃孫為了出洋求學，先是在母、兄的支持之下變賣家產，而對於破產求學一事，母、兄都無質疑也不猶豫。在日本求學畢業後，又轉往美國進修。抵美入關時遭中、美官員刁難，後得到日本領事仗義相助。順利入境就學後，還有各種生活上的磨難，但是他一一克服，不但學業表現名列前茅，且因此獲得中外友人的敬重與協助，最後終於學成歸國。在刻苦曲折的遭遇中，時時展現黃孫優異、超凡的才學與人格光輝，於是一切苦難都成了成就黃孫美好形象的元素，黃孫奮鬥的經歷也成為上進、成長且獲得美好果實的過程。^{註十四}女權及女學文本述及女子想進學堂，則多數得先耗費一番口舌與工夫，幾經波折才能徵得家長（通常是父母或丈夫）的同意，如願入學以後也未必一帆風順，不少時候還難免中途生波，有的就此學業中輟（甚至以死明志），有的則是經過再次的奮鬥或另有「有力人士」出面，才得以重續學業。如《女子權》的袁貞娘，她在中學堂裡面成績優異，且已考取北京高等女學堂肄業資格，卻因父親誤會她「偷漢」，不但不許她赴北京入學，同時大罵一場，指斥她「玷辱門風」。在辯解無門，又羞愧又絕望的情形下袁貞娘投江自盡。父母則在痛失愛女的打擊後，才驚覺對待女兒過於孟浪，未能明辨事實曲直。幸好貞娘於江中獲救，死裡逃生並幾經波折，才換得父親首肯，得以繼續學業。^{註十五}《娘子軍》中趙愛雲想進學堂但得不到丈夫的允許，丈夫要求她每日好好在家，纏小腳，梳妝打扮，服侍丈夫及公婆即可。後來愛雲說服婆婆，再由婆婆徵得公公（地位更高的權力者）同意，得以如願入學，但丈夫始終不滿，頻頻吵鬧、口角。公公去世後，丈夫立刻以休妻為要脅，禁止她繼續上學堂（其實這時愛雲已經由女學堂畢業，擔任女教習之職），最後是女學校長出面說服，才有圓滿結局。^{註十六}二書的女主人公雖然最後都能如願就學，完成學業後還能學以致用，但在風波不斷的求學過程中，罕見有關學識充實後的進步與喜悅之敘述，也不特別強調女主人公奮鬥過程所展現的精神或人格，因求學風波而衍生的苦悶愁惱、抑鬱疾病反才是描繪形容的重點，文本中於是充斥著為數不少的愁病篇幅。像袁貞娘每遇到一次風波，就會因而生一場病，等到風波有了解決方法或出現轉機，她的病才會好轉。^{註十七}趙愛雲遇到丈夫刁難斥

註十四：參《苦學生》，《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54卷（同上註），頁127-175。

註十五：參《女子權》第2-3回，頁14-21。

註十六：參《娘子軍》第4-8回，頁479-510。

註十七：參《女子權》第7、12回，頁44、71-74。

責，則往往向長輩（例如：婆婆、女校長）痛哭、投訴。^{註十八}女學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基本上不脫溫順柔弱、忍氣吞聲的傳統女性樣版，與教育小說中的男學生形象迥然不同。愁病苦惱不斷的女學生遭遇，甚至還有可能引起讀者這樣的錯覺：假如不要上學，不就沒事了？因此當女學文本以氣急敗壞的口吻，強調婦女不學對於種族、國勢的影響有多麼嚴重時，文本的其他敘述卻同時在無形中削弱婦女求學受教的權利感與重要性，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文本正視婦女受教的決定權問題，父親、公公、先生的允許宛若是天經地義，無可置疑的。

婦女求學不但有決定權的問題，還有其他問題。《女獄花》第十一回，許平權在女學堂的開學演說中說道：

女人的弱點在於依賴性質，〔……〕若要權利，先貴獨立。同胞妹妹啊！我們今日不必去奪男人的權利，只要講求我們的獨立。若我們能獨立，那男子不得不將權利還我們了。講求獨立的方法僅有兩條：一條是除去外邊的裝飾，一條是研究內裡的學問。〔……〕泰西女人無不練習柔軟體操，故筋骨強健與男子無異。我們女人，專講裝得如花枝一般，嫌身軀雄健，每有減食為瘦弱的，非有大事，絕不肯散步街市，終日坐在深閨，描鸞刺鳳，以致思想呆滯，做起事來，較男子終遜一籌。照此看來，女人若有學問，絕不如此舉動，被男子種種看輕了。且更研究歷史地理，則世界大勢心中了然，思想自然而然發達起來。精通格致算術可以製造器械，謀些銅錢，不必生食男人的血本。咳！我們女子能夠如此，男子自然恭恭敬敬，兩手捧了權利還我們呢。^{註十九}

這一番話表面上看似愛深責切，實際上卻完全忽視男女處境不平等的既存事實。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剝奪了女人的獨立與活動能力，小說中卻反過來責備女人為「依賴性質」、「終日坐在深閨」。晚清以前由來已久的纏足習俗、美貌要求以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風氣，物化了女人，並迫害女人的自我發

註十八：參《娘子軍》第4、7回，頁482、501。

註十九：參《女獄花》第11回，頁753-754。

展，小說中卻一味指責女人為裝扮愛美、「思想呆滯」。於是，這一番話既鼓勵女人，也責罵女人；既呼籲婦女上進，也踐踏婦女的身心。如此矛盾而並存的言論型態，是晚清女學論述常見的模式。說者以十分輕蔑不屑的口吻，將「現在」女人的知識程度、行為活動表述成愚蠢、膚淺、固陋的形象，並且歸咎於女人自身的依賴自弱，男人和「泰西女人」則被表述為較中國婦女更高一等的類群，此中不但流露傳統以婦女為「第二性」的輕視心態（小說中所推崇的「泰西女人」，其實也是西方社會的「第二性」，但晚清當時在西／中、強／弱的二元對立思維中，根本無暇也無心注意及此^{註二十}），而且無形中全盤否定當時婦女的現實處境及應有的人格尊嚴。姑且不論所謂「依賴」、「裝飾」云云，其實是男權制度長期壓抑的結果，這段話的論述邏輯還內含一個更根本性的價值判準：一筆抹煞掉當時現實中女人的一切價值，另外豎立一個完全脫離現有生活行為的理想標竿，不但鼓勵女人須努力追求，事實上也等於在指示／下令女人必然如此才有「人格價值」——女人是否可能擁有不同的選擇及權利？此中包含對現實婦女的種種輕忽、不屑，完全不顧慮婦女現實處境與人格，而一逕以強勢姿態與要求加諸於女子——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對婦女的霸道與戕害？這是晚清女學論述的典型模式。它提供婦女追求知識、追求獨立的「命令」，而不是「選擇」，而且以二元化的方式簡單把「知識—獨立—人格價值」與「無知—依賴—無人格價值」對立起來，並對所有的現實婦女宣判，而無視於處境紛繁多樣，不能一概而論的實際婦女的狀況。

然而它的現實效用是，形成一種強而有力的論述情境，既滿足傳統男人的優勢心理，或許基於同情、扶助弱者，並且在強種強國的背景支持下，^{註二十一}開闢出婦女向學的新途徑。

值得注意的還有其中提到的「學問」內容：歷史、地理、格致、算術等。這一段話是女學堂開學典禮上的校長演說，文本並沒有描述女學的學科內容或

註二十：晚清對西方女子的真正瞭解有限，有時還難免產生誤解，不過西方女子的人格形象對於女權運動，實際上有過很重要的意義。參夏曉虹〈英雌女傑勤揣摩——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文藝研究》1995年第6期，頁87-95。

註二十一：晚清女學的倡導基本上是以強種強國為終極目標，婦女的自主自立在口號上雖然被頻頻提起，但實質上也僅止於口號而已。這方面的相關論述極多，可參考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洪曉慧〈晚清女性政治文本的性別與家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課程安排，有關女學堂的學習、功課內容，幾乎在所有小說文本中都是側面帶過，而這一段是現有小說文本中特別異樣的，因為它提到了「歷史、地理、格致、算術」這些科目。在其他文本中，被提出來的女學學科大都是文學、女紅、刺繡、家政、姆教，^{註二二}大不了再加上醫學、看護學、蠶桑學，^{註二三}基本上是以傳統性別分工的實用技術、知識為主。《俠義佳人》甚至明白指出女子教育應該以工藝廠為中堅，女學堂為左右翼；以工藝為正科，讀書為附科。^{註二四}當時的女子教育並非立足於婦女本位，也不以婦女自我發展為目的，所謂追求獨立、自由、權利等等，其實只是站在強國強種、改良家庭教育、培育國民（「女子為國民之母」）的立場上，以鮮亮的口號作為說服的利器，而給予婦女一些「有用」（可用於賢妻良母職能所需）卻有限的知識領域。^{註二五}恰如《六月霜》裡面透過秋瑾之口，批評那些女學學科「都不過是救拔他們的軀殼，同表面形式上的自立罷了」，要從根本上使男女平等，使女子自立，這樣的學問，在當時是「也沒有這一科科學的」，「也沒有地方去學」。^{註二六}換句話說，女學的呼籲及女學堂的開設，的確提供了婦女求知的新空間與似科學化的知識領域，卻不能提供充分的選擇，也不見得能滿足所有婦女的需求。但是相對於晚清之前流行於社會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調，此時女學的開放卻已是一大突破，對許多因此而受惠的婦女而言，這也是一個超越傳統的契機。舉例來說，《六月霜》中秋瑾提出那一番見解與批評，很難說不是站在提倡女學的風氣、環境的基礎上，才進一步發展出來的。

由上所述，應該已經不難體會女子教育發展的坎坷與曲折。從小說文本敘述可以感受到，婦女是站在毫無現實尊嚴的立足點上，一步一步走向求知之路，求知的範圍又多數被囿限在傳統性別分工之下，受教權與知識的選擇權其實仍操於旁人（主要為男權掌控者）手中。然而就在種種有形無形的限制條件下，極少數的婦女還是發展出屬於自我的認知與批判能力——像《六月霜》秋瑾那樣的批評，或許才具有屬於婦女自身的覺知的突破意義。

註二二：參《娘子軍》第4回，頁483。

註二三：參《六月霜》第9回，頁165。

註二四：參《俠義佳人》第8回，頁176-177。

註二五：筆者另有一文〈晚清小說中的性別、主體與困境〉（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明清文學與思想中的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10月22-24日），亦論及女學內容及教材，可參照。

註二六：參《六月霜》第9回，頁166。

三、行動權與空間權

傳統所謂良家婦女，一般是鎮日靜處深閨，不輕易拋頭露面，即使在自己家裡面，也要「合宜的」迴避與外來的男客碰面。《娘子軍》中的趙愛雲出嫁前雖然終日喜歡看書，卻一人在家獨學，從不出閨門一步，^{註二七}《黃繡球》中的黃繡球也是「守著婦女不出閨門之訓，一步不敢胡行亂走」，以致黃家大門外連東西南北的方向也分辨不清，村子里有多少人家，有什麼山水田畝道路，道路又連接何處，更是一無所知。^{註二八}小說中的這些敘述，再現了傳統「閨訓」對婦女的要求與限制。女子學堂開辦以後，上學的婦女勢必要走出家門，留學的風氣一開，則婦女不但走出家門，更且跨出國門，遠渡重洋，乃至遊歷全球五大洲也不見得是想像不到的。《女子權》的袁貞娘就是在故事虛構的一九四〇年代，由湖北而北京，由中國而俄國、德國、法國、英國、美國，遍歷歐美多國。^{註二九}女學的興起不但使婦女獲得受教求知的機會，而且伴隨行動自由的開放、活動空間的擴展，婦女的生活範疇與生活事務同時產生大幅度的變革。上學的婦女可以接觸到學校的教習、同學、同學的親友以及校際活動時其他學校的學生。屬於個人的人際網絡開拓了，婦女的個人力量也開始形成。《女子權》的袁貞娘就是利用遊歷各國的機會，接觸各國婦女，建立聯絡網絡，並運用人際網絡的力量，向中國政府爭取女權，最後並實現自己的個人願望。《俠義佳人》的孟迪民及其他曉光會會員，也是在知識能力和行動自由的支撐下，遊歷各處，從事各種啓迪婦女、救助婦女的事業。《女媧石》中留學美洲歸來的金瑤瑟，尚且喬裝改扮，忽而出入妓院，忽而入宮行刺太后，忽而遊歷全國，調查黨派，聯絡黨人。女學開放連帶引起婦女各種身心活動的開放與擴張，在這些小說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映現與想像，敘事寫景中也湧動著某種自由開放的活潑氣息。《女獄花》寫沙雪梅逃出監獄，決定以「鐵血主義」為女子爭取自由以後

自己暗暗策勵了一番，信步走了十數里。只見前面好像火山一般，萬道紅光，沖天映地，心中很是疑訝。急急走了數十步，仔細向前一看，原來是千株萬朵的杏花，開得珊瑚瑪瑙一般，

註二七：參《娘子軍》第1回，頁457-458。

註二八：參《黃繡球》第3回，頁187。

註二九：參《女子權》第8-9回，頁47-57。

雪梅心中頓覺一爽。且顧且行，且行且顧，杏花疏處，露出一個酒帘兒來。雪梅心內想道：飲酒賞花，最是人生樂趣，今日適逢其會，倒可消遣片時，解解憂悶。^{註三十}

這是其他文本描寫女子活動空間時難得見到的片斷。野外的自然美景，開闊而自在的廣大空間，單獨而無拘束的個人行動，傳統女子何嘗擁有過這樣的自由與自適。《俠義佳人》中的高劍塵被塑造成文明女性的表率人物，在言語上雖曾說過重視游歷以增長學問的話，^{註三一}她也的確在上海、蘇州之間來來去去，擔任女教習或女顧問，但當她與丈夫打算游湖，巧遇丈夫友人後，還是由於「不好意思」而迴避上船。^{註三二}傳統婦女的行動限制，一方面開始有大幅度的突破，另一方面則仍有相當程度的保守。在街上或戶外行走的婦女，不見得已經擁有自由的感受與權利。

此外，傳統的行動限制不僅在物質上束縛婦女的活動空間、生活領域，而且進一步形成一種價值判斷的眼光與標準，婦女一旦有意擺脫行動及空間的限制，將立即遭受優劣良惡的評價與批判。黃繡球放了小腳，想上街看會，不但遭到丈夫黃通理的指責、阻止（丈夫名「通理」，暗指他已是當時的開通人士），而且自己也擔心果真成為人家的「笑話」。^{註三三}《最新女界鬼域記》描寫北黨學生與南黨學生的區別，聯繫著品學兼優與學行頑劣的要素，就是愛不愛出門遊逛。品學兼優的北黨學生除了不請假、不逃課外，平日大都閉門讀書，既不聚集聊天、吃喝、笑鬧作樂，更絕無出門上戲館、茶館或在街上吃飯、遊逛等情事。南黨學生則一天到晚找藉口、找機會上街，遊逛，看戲，吃飯。婦女雖然獲得了自由行動的機會與空間，卻沒有得到行動自由的正向肯定與價值判斷，喜愛自由行動的女人，很容易遭受傳統閨訓標準的無形批判，被表述成品行不端、愚頑蠢陋，甚至下流無恥的形象，《最新女界鬼域記》的謝沈魚、于鶯娘就被塑造成這樣的角色。其中于鶯娘一開始就是因為喜歡邀結女伴「向蘇州、上海」，「作無事逍遙游」，她的父母惴惴不安，才想藉著送她進學堂好管束她，並「增長些學問」。謝沈魚則一出場，就被表述成好作閒游、不安分的女

註三十：參《女獄花》第10回，頁729。

註三一：參《俠義佳人》第18回，頁296。

註三二：參《俠義佳人》第32回，頁549。

註三三：參《黃繡球》第2-3回，頁185-187。

學生。^{註三四}這兩個人物，是小說所謂「女界鬼域」的代表形象，而她們行為的根本弊端，就是不安於室。她們在學堂的圍牆外（圍牆內才是她們應該待著的「正確合宜」的地方）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被描述成鬧笑話、做蠢事，總之一無是處。

同時，家庭以外的街道、商店等公共空間，終究仍理所當然的歸屬於男人所有，女人的「入侵」不但如同侵犯男人領域，而且簡直是自取其辱。《最新女界鬼域記》與《俠義佳人》都描寫到女學生在街上被男學生追逐、調戲的情節。《俠義佳人》裡「啓黃女學校」的女學生倪國秀回家途中，遭到一群男學生圍觀、追逐，還追到家裡面，並在家門口三番兩次敲門搗亂。女學堂的女教習白慧琴到男學堂向校長荀曾植抗議，也遭到校長奚落，說：「女學生如果正經，那怕什麼男學生追趕？」又說：「依我說，以後女學生少出來，就沒人追趕了。」後來是林飛白（高劍塵之夫）及時趕到，才化解了僵持不下的場面。^{註三五}《最新女界鬼域記》的謝沈魚與于鶯娘在戲館看戲時，已經遭到一群男學生的揶揄、調笑，回學堂途中，那群男學生跟前跟後，「瞧瞧沈魚，又瞧瞧鶯娘，喧嘩笑語，爭以夫婿自居」，「無歇無休，喧喧嚷嚷」，「詼諧調笑，譏刺品評」，二人最後坐上「轎式快車」（馬車），才擺脫那一群大登徒子。^{註三六}過去被禁錮在家庭裡面時，街道是女人的禁地，如今婦女可以自由行動了，街道依舊是行使男性威權的舞台，一旦出現性別紛爭，便習慣性的歸咎於弱勢的一方：「女學生如果正經，那怕什麼男學生追趕？」恍若犯錯的是被追趕的人，而不是追趕人的，並且進一步導出處置的方式與結論：「以後女學生少出來，就沒人追趕了。」意圖要所有的女人留在「她們的地方」，謹守「界線」。^{註三七}

在戲館被男學生戲弄的謝沈魚與于鶯娘因為看戲看得入神，加上聽不懂那些學生口中賣弄的英文，於是「爾為爾、我為我」的看完一齣戲，^{註三八}但稍早在書店買書——

註三四：參《最新女界鬼域記》第1-3回，頁541-553。

註三五：參《俠義佳人》第20回，頁315-316。

註三六：參《最新女界鬼域記》第3-4回，頁556-562。

註三七：參Leslie Kanes Weusman 著，王志弘、張淑玫、魏慶嘉譯《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頁99。

註三八：參《最新女界鬼域記》第3回，頁556-557。

這時櫃臺裡眾伙計，不論少的壯的村的俏的，如同吃齊心丸，都一眼勿殺含著似笑非笑，十八個畫師畫勿像個腔調，對準櫃臺外。幸而沈魚素來個儻，盡你無數的眼毒結聚他身上，總也毫不介意。鶯娘究屬新出茅廬的，早被那些人看審脫了。^{註三九}

在這裡可以鮮活看到公共空間裡面兩性之間剝削性的雙重標準。屬於男人的「消遣」特權之一是「觀看女人」，不論她們是否喜歡，很少有女人能在這樣的情形下逃脫箭般的眼光。無論是「沒有惡意」（男人通常稱之為玩笑）的調笑戲弄，或者無聲無臭的含「毒」眼光，其實都是一種凌越一切的男性權力的訊息。這種雙重標準，造成了約翰·柏格（John Berger）所謂的公共空間中的「分裂意識」（split consciousness），柏格解釋：「男人行動，而女人現身。男人觀看女人，女人則看著被人觀看的自己。」^{註四十}

於是，為了保護自己，女人繼續把自己包圍起來。《俠義佳人》裡建築、設施號稱完善的「曉光會」女學堂，「總會四圍圍牆，堅高無比」，「會中各會員及強壯的學生，其會放槍的，不下二三百人」，會所周圍，「日夜均有人輪流偵探」，^{註四一}依靠圍牆、武器、探子，層層防禦，構成屏障，保護女學生的安全及「名譽」（至於男學生離家求學或在外界空間的一切活動，則沒有名譽擔憂及安全保護的問題）。女學生脫出家庭的牆圍之後，一方面有了較廣大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也同時構築更高、更多層且更封閉的防護線。這些號稱完善周全的防護線所表徵的，其實是由於女人走出家庭界域而隨之攀升高漲的焦慮與不安，當時這種焦慮不安恐怕遠勝於活動空間擴張之後的開放感與自由感。

與此相彷彿的是，在小說裡面，女人從事和進行各種活動的空間，大部分

註三九：參《最新女界鬼域記》第3回，頁554。

註四十：此處討論文字參照Leslie Kanes Weusman 著，王志弘、張淑玫、魏慶嘉譯《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同上註），頁98。John Berger 的話，原文作：「〔……〕 men act and women appear. 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England: BBC and Penguin, 1972), p.p.45-47. 中譯本有戴行鉞譯《藝術觀賞之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49-51。戴行鉞譯文作：「男子重行動而女子重外觀。男性觀察女性，女性則注意自己被別人觀察。」本文採用《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所譯。

註四一：參《俠義佳人》第17回，頁284。

仍在圍牆裡面——不論在中國、俄國或英國、美國，也不論是在北京、上海或蘇州，女主人公也許搭過馬車、火車或船隻，文本主要描繪到的，她們的活動乃至事業進行的場所，多數是在船艙內、旅館內、學堂內或其他集會場所內，也就是固定、封閉而有遮蔽的有限空間。《女子權》寫袁貞娘遊遍各國，聯絡婦女同志，對於戶外的景致或觀賞活動，幾乎未曾著墨，絕大部分的活動空間是在室內。《俠義佳人》寫多位「曉光會」成員或相關人士行走各地，其實主要事件進行的場地，不是在家中、院落內、園林中，就是在學堂或演說堂中，即使述及戶外的場景，也是簡略數語，匆匆帶過。女人要能享有空間的控制權，要能在開放性的空間中自由自在，其實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四、男女互動——平權？

雖然婦女的自由開放其實仍相當有限，但與前代婦女的處境比較起來，晚清時期的女人（尤其是女學生）在權利方面，的確得到大幅度的突破與進展，對於當時的社會觀瞻及輿論而言，這已經是一個亟需調適的新狀況。由此導致驚嚇、恐慌，特別是男性／男權的焦慮，似乎是調適過程很難避免的。《黃繡球》中的女主人公黃繡球在放腳、上街以後，「惹得街上人家見了驚奇動怪，一齊哄上來看。」——不僅看，還尾隨跟蹤：

一班人跟在後頭，此說彼猜，紛紛議論，一直跟到黃繡球家門口。男的散了一半，一半還立在門外，等聽新聞，那些女的，就跟進大門內，有看的，有問的〔……〕。^{註四二}

這一幕卡通式的鬧劇，活畫出婦女在追求自由開放的過程中，所遭受的（男權）社會眼光與輿論壓力。一向處於被觀看境地的婦女，這時簡直成了奇觀大展的活物。黃繡球終於因為這種「驚世駭俗」的行為而銀鑕下獄，並且幾經波折才得以出獄。^{註四三}下獄、出獄，還有活路，女學生由於行動比傳統婦女較為開放，一旦觸犯嫌疑，分辨洗刷的空間不但沒有放寬，反而縮小，乃至於有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緊張性。《俠義佳人》寫江陰縣「啓黃女學校」的學生方天圭賭博輸

註四二：參《黃繡球》第3回，頁192。

註四三：參《黃繡球》第3-6回，頁195-219。

錢，母親卻誤會她在外行為不端，有「輸了人」的嫌疑——

這個當兒，家中人聽見他娘兒兩個在房中鬧氣，不知道是為什麼事，都趕了進來看，擠了一屋子的人。天主見眾人圍著問他，又羞又愧，又氣又恨，他媽又不許他分辨，就是勉強分辨幾句，他媽只是說他說謊，哪裡肯信？又兼眾人不倫不類的替他圓說，有的說：「二嫂子不要說他了，孩子小，一定被那不要臉的男人騙了。」有的說：「三丫頭向來狠規矩，不曉得怎麼上了人的當，下次改了罷。」又有人說道：「姑娘家這個名頭還了得？傳揚出去，還有那個來提媒？」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天主真是上天天無路，入地地無門。並且眾人說的話，不是說他賭錢，是冤枉他私奔。方天主處此境地，竟無從申冤，無從泄氣，怨怒極了，不覺將心一橫，分開眾人，一口氣向樓上直奔。回到自己房中，不覺淚如泉湧，自思與其羞辱而生，不如清白而死。^{註四四}

文本細膩的刻畫，鮮活的再現了「眾口鑠金」的力量。此中「眾人」所代表的，正是傳統社會的評價及眼光。無所不在的社會輿論及傳統評價，對於女學生在外的不軌（其實是一種不信任）只會添油加醋，繪聲繪影。稍後方天主果真自殺身亡。至於眾人口舌力量的來源，其實是傳統禮教對婦女的單向規範。這一場母女紛爭，起因於方天主未經家人陪同，就自作主張從學校獨個兒回家，而被母親責怪「姑娘家一點樣子都沒有，滿街上亂跑，成個什麼規矩。」^{註四五}女學生在前提上已經失了「規矩」，男女嫌疑之際，被認為更加沒有辯解的立場，所說的話也更加缺乏可信度，再加上對女人貞節的單向要求，以及貞節相較於生命之重要性的道德強調，方天主之死，絕非個別偶發事件，而是「新興」的女學生社群與傳統女教、閨訓相互牴牾、扞格的結果。這也是女學興起的過程中，一齣活生生的悲劇。

更有甚者，面對方天主這樣的悲劇，男權價值觀的操弄與控制仍凌駕於一

註四四：參《俠義佳人》第21回，頁333-334。

註四五：參《俠義佳人》第21回，頁330。

切、甚至事實真相之上。方天圭的家人在痛失愛女之後，其他問題都不再追究，獨獨怪罪「總是那婊子學堂不好」。^{註四六}以「婊子學堂」為稱，並不是方天圭家人的特別發明，乃是當時對於女學生的行為尺度，以傳統謹守閨範的良家婦女與出入社交場所應客的妓女為參照系，而產生的一個對照性總稱。可見時人對女學堂及女學生的一般觀感。

其他小說裡面，凡在茶樓、酒館、街道出入的女學生，大半被再現為習氣敗壞、品行不端的負面形象，其基本預設完全不出上述立場。而以此類負面形象為主，集中描寫女學堂及女學生「怪現狀」的，則有《最新女界鬼域記》，此書可視為當時（男權）社會對這批新興社群的焦慮的反映。與上述論點可以相互印證的一點是，《最新女界鬼域記》裡面藏污納垢的「昌中女學校」，其創辦人恰恰就是某已故道台的側室、妓女出身的「金燕姐」。故事空間設定在「金燕姐」創辦的學校裡面，以當時人的觀點來看，是深深含藏著「春秋大義」的。

女學生追求知識，過程雖然艱辛，一旦完成學業，再欲追求個人事業與自我發展，所遇到的阻力恐才是加倍艱辛。當時提倡女學，是以「做個母教榜樣，然後家庭教育造就一班完全的男國民出來」為訴求，（男權）社會認為婦女的最高價值與責任，是相夫教子，能做「賢婦」、「賢母」，^{註四七}所以女學生的最終與最佳出路，仍是回歸家庭。《女子權》的袁貞娘遊歷世界各國，結合各地華僑婦女，向中國政府爭取到自由結婚權利，最後她的歸宿，是與意中人鄧述禹完婚，「自此月圓花好，長樂未央」。^{註四八}《女獄花》的許平權在興辦女學有成之後，基於「我若不婚嫁」，恐「大傷天地生成之道」，「為二萬萬女子的禍根」的考慮與擔憂——平權的憂慮，其實是反映了（男權）社會的焦慮——遂與相知已久的黃宗祥完成婚禮，「當日平權夫婦的恩愛，自可不言而喻。」作品最後乃以「極描寫愛情二字」的一首七言絕句作結。^{註四九}《娘子軍》的趙愛雲幾經波折，最後還是與丈夫言歸於好，琴瑟調和，書末並點明：

如今作書的人，千言萬語都是描寫文明女子應配文明男子，逃

註四六：參《俠義佳人》第21回，頁335。

註四七：參《娘子軍》第6回，頁495。

註四八：參《女子權》第12回，頁76。

註四九：參《女獄花》第12回，頁759。

不出振興女學四個字。閱這部《娘子軍》的女子快快去學罷。^{註五十}

「振興女學」原來竟是文明男女速配的不二法門！這可不是個別、單獨的特殊意見，各種描述女權與女學的小說，「千言萬語」，最後都將女子的文明與出路歸結到匹配與相當之人為妻，男女的互動則以愛情關係為終極理想。那些與丈夫離異，或者不嫁，甚或殺夫的女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六月霜》的秋瑾、《女獄花》的沙雪梅、文洞仁，不是被朝廷正法，就是自焚而死，或一病而亡。《六月霜》寫秋瑾事蹟，著重在為秋瑾申冤。所申之冤則強調秋瑾主張家庭革命，並非種族革命，因此朝廷之殺秋瑾其實是冤枉的。^{註五一}不論歷史上的秋瑾究竟是贊同家庭革命或種族革命，小說強調秋瑾乃因主張家庭革命而導致枉死，且對秋瑾離婚一事不表贊同，正好反過來加強家庭革命所可能引起的危險不測，也對從事此類運動或有意參與、支持的婦女產生無形的恐嚇、嚇阻。

《女獄花》的沙雪梅殺夫下獄後逃亡，組織女界革命黨，後因舉事不成，自焚而亡。文洞仁自幼立誓不嫁，以著書喚醒女同胞為職志，最後則患吐血之症，一病而亡。^{註五二}小說雖然塑造了她們激進前衛的形象，卻以不得善終的方式，暗示了激進前衛的下場。和平合軌的生活方式和和諧美滿的婚姻愛情，才是女性角色真正的歸屬及幸福。在這些人物形象及情節發展的裡層，男女的社會角色與性別分野，不但沒有脫越傳統，反而有延續、加強、鞏固的傾向。

《娘子軍》的趙愛雲從學堂畢業，應聘擔任女教習之後，曾有過那麼一點「平權」的靈光閃過：「我此番既然畢業，就好自立，本應和丈夫算賬，各分疆界，好了我平分權利的苦心」。^{註五三}她的丈夫守舊頑固，小說為之命名為「李固齊」。自從愛雲嫁入李家，固齊不是要求她纏小腳，就是要求她妝飾服役，天天在身邊伺候，兩人／兩性之間屢屢爆發時大時小的衝突與緊張。當愛雲有了經濟自立的能力後，意欲與丈夫「平分權利」（怎麼分？恐怕還是一個難纏的問題），實是基於平日受氣已久的緣故。但是愛雲的念頭，在想及「公公待我不薄」，「況且年已老大」之後，又隱忍壓抑了下來。^{註五四}此中含藏著一個很有趣的訊息：（男權社會）意圖以權利掌握者所施予的恩惠（是或不是恩惠，

註五十：參《娘子軍》第12回，頁536。

註五一：參《六月霜》第1、2、6、9回，頁116-125、144-149、164-167。

註五二：參《女獄花》第3-6、9-10回，頁718-735、744-750。

註五三：參《娘子軍》第6回，頁494。

註五四：參《娘子軍》第6回，頁494。

則是另外的問題），使女人感恩，並進一步成為追求女性自立自主時的顧忌或不忍（也就是障礙）。根據文本的描述，遇到開明的掌權者（如愛雲的公公），女人或許應該懂得感恩，若遇到專制的掌權者（如愛雲的丈夫），女人則只有痛哭流涕而已。果然愛雲的公公一死，丈夫固齋立刻表態：「父親已死」，此後一切事情「都要由我主張」，命令愛雲辭職回家，伺候丈夫，否則即以「休妻」處置。^{註五五}丈夫在這裡所擺出的高姿態，是男人／男權慣常對待女人的方式。面對自主能力逐漸提高的妻子，男人運用更霸道強硬的權力優勢，試圖打壓抑制。這些片斷，再現了兩性在平等自由的追求進程上的衝突、緊張。李固齋對於力求上進，學識、能力都日漸提升的妻子，應付之道是搬出傳統夫權：「孔夫子尚且出妻，何況我等呢？」^{註五六}男權既得利益者對於女學與女權的恐慌、焦慮，在此隱隱浮現。

而愛雲面對丈夫的無理取鬧及霸道要求，完全提不出有力的反抗，只能回到學堂，向女校長沈振權「放聲大哭」。沈校長一開始似乎也採取激進姿態，要廣印傳單，召集女教員、女學生，集合一班「娘子軍」，向李固齋興師問罪，團結爭權。後來卻以重重提起，輕輕放下之姿，邀請李固齋前來懇談，於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場可能天大的風波就這樣和平落幕。李固齋從此痛改前非（如果不痛改前非，故事可能就很難收場了），並且也努力向學，最後成為一名男教員，與趙愛雲夫唱婦隨，恩愛和諧，再也沒有家庭問題了。^{註五七}

由此可以看到，晚清女學的提倡，號稱女界「自立」，追求男女「平權」，其實有關男女互動模式的認知，大半還停留在傳統的性別意識層面。文本雖然鼓舞女人提升知識、處事能力，卻絕不鼓勵女人跳出兩性既定的藩籬，特別是傳統兩性互動之時，男女的嫌疑分際，以及陽尊陰卑的層級關係。

註五五：參《娘子軍》第7回，頁500。

註五六：參《娘子軍》第7回，頁500。

註五七：參《娘子軍》第7-9、12回，頁500-514、531。

五、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註五八}晚清小說中的女學論述在許多面向上具有錯綜紛繁的關係，不過在似乎令人眼花撩亂的繽紛表象底下，有一個基本的大前提並沒有受到太大撼動，此即傳統的性別意識。女人獲得了上學求知的機會，較為開放的活動空間，但關於受教的決定權及知識的選擇權，空間的享有權及行動的自由權——簡而言之，即自我的主體權，基本上還維持著男權社會的既定權力結構及運作模式，女人在權力問題上還不能輕易越雷池一步。無論關於女人的前途，或者兩性的互動關係與方式，女人在追求「文明」、「開化」之後，兜了一個大圈子，最後還是回到賢妻賢母的分位上，浸潤於兩性的濃郁愛情之中。至於那些有意或無心而侵犯到男權疆域的越界者，文本除了運用「高尚道德」、「完美人格」之類的話語，鼓勵「正道」，針砭「邪魔」，並在敘述中諷責、嘲弄以求嚇阻，往往也毫不留情的予以「處死」——男性面對著知識女性的逐漸醒覺與自立，已經感受到既有權力受到挑釁的威脅與焦慮，並試圖衛護傳統的權力版圖。不過教育制度的變革、教育空間的獨立與拓展，在有形的基礎上開啓了婦女身心解放的一扇大門，女人走入這扇大門，等於走出了傳統性別禁錮的第一大步。女人擁有制式化的學堂後，所得到的不是只有知識，同時也獲得名正言順的、開放性的、具有發展可能性的社交網絡及活動領域，即使初期這種社交網絡及活動領域還受到多種有形無形的打壓與抑制。女人在一方面緩步開放，一方面還力圖封鎖或半封鎖的（男權）社會情境與氛圍中，迂迴曲折、逐步漸進的走向追求自立自主、自我發展的新道路。即使到了今天，這條道路上的跋涉者也還在持續努力中。^{註五九}

註五八：本文的論述以晚清小說文本為範疇，在討論的過程中曾經一語提及前代婦女（見於第四小節第一行），以作為比較，卻未能深入闡述，以供對照。如果能提出明清婦女（特別是才女）的處境及遭遇作為一種參照系，也許本文的論點將可有更廣更深的向度，不過這樣一來，本文也可能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於現有的面貌。晚清女學與明清才女之間的參照系，也是筆者很感興趣的論題，也許可以期諸來日，另文處理。在此先向本文特約討論康來新先生至上由衷謝意，她的建議對筆者深有啟發。

註五九：本文初稿曾於「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晚清四〇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該研討會由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台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於民國91年11月7、8日舉行。